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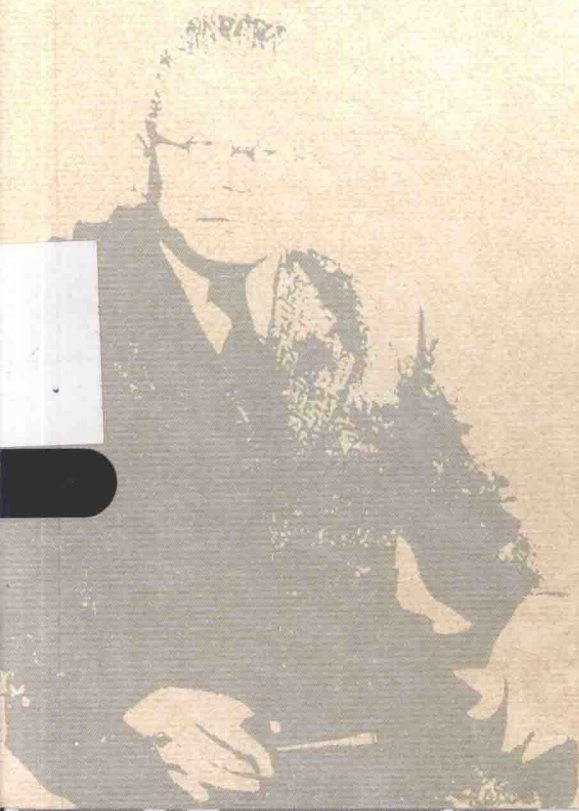
执行主编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傅斯年

卷

唐元明 编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傅斯年
时 主 编
玺 执行主编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傅斯年

卷

唐元明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傅斯年卷 / 唐元明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36-8110-4

I. ①现… II. ①唐… III. ①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第 210911 号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傅斯年卷

XIANDAI DAXUE XIAOZHANG WENCONG FU SINIAN JUAN

出 版 人:郑 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统筹:王 骏 钱 江

责任编辑:朱 矾

装帧设计:阮 娟

技术编辑:王 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1,63683013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21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序

—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一个日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戊戌变法失败了。一边是慈禧再度“训政”,一边是废黜光绪,废除新政,对倡导变法维新人士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其中独有一项“成果”经过一个老人的巧妙运作保留了下来,那人是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那“成果”便是京师大学堂。

也许是经过变法者心血与鲜血的滋润,这粒中国现代教育的种子开始了它的倔强生长。

至1949年,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它的格局、架构已基本形成。

由此,人们常常发问: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袁氏复辟,走马灯式的北洋政府;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水深火热几不聊生;外敌入侵,十四年抗战,虽取得胜利,接踵的又是国共内战。如此时空背景,常常使课堂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能够生长,且健全了各门类基础学科,诞生了一批名校,培养出了惠及后世的大量杰出人才,在教学相长过程中走出了大批大师

级的教育家、科学家、思想家。为什么？

钱学森先生曾这样发问。

每个人一说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时，总会想到蔡元培先生，总会想到西南联大，更会这样发问。

二

2010年3月14日下午，首都机场。全国两会结束，各地的政协委员返程。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正坐在过道边的椅子上。那段时间，他是热门人物，一直被媒体包围着，此刻他好像很累很疲倦，但仍有记者不停地同他说着教育的热点话题。作为安徽政协委员向中央报送信息的联络员李传玺也站在旁边听，并不时对朱清时先生切中肯綮的评论报以由衷的赞美。

“你是哪家报社的？”朱校长问李传玺。

《江淮时报》副总编常河先生站在旁边，向朱校长介绍了李。

“噢，你研究胡适啊，我对30年代那批大师，尤其是那批大师级的教育家非常佩服。”

这句话也埋下了一粒种子。

2012年初，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就职的王骏先生询问李传玺，今年有没有好的选题。

李传玺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在首都机场与朱清时校长谈话的画面，以及朱先生最后的那句话。何不请朱清时先生担纲编选一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王骏向社领导做了汇报，很快得到了同意。可朱清时校长能同意么？初春的一个下午，李传玺拨通了朱清时校长的电话，虽然天气不热，却紧张得一手心汗。没想到朱校长听完了介绍后，欣然同意。

于是有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书。

让我们倾听一下那些大师们的声音。声音都不是那种激昂慷慨式的，很平和，却更入灵魂。

蔡元培先生：“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张伯苓先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蒋梦麟先生：“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学校之惟一生命在学术事业”，“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畀以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阻挠也”。

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胡适先生：“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和工作人员”，“只有在自由独立原则之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

竺可桢先生：“科学精神就是求真，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

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

.....

不需要再引了,读着这些话,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也许自会得出本文开篇所提疑问的答案。即使不是,你也会强烈感受到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教育胸怀。此书还选收了大量大师们其他方面的论文甚至美文,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大师们多面的风采。

李传玺

2015年3月

目 录

导读

- 1 亦儒亦侠的傅斯年 唐元明

第一辑 教育类

- 13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18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23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29 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
33 论学校读经
38 闲谈历史教科书
48 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
56 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
68 “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
72 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
76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第二辑 时论类

- 111 文学革新申义
121 《新潮》发刊旨趣书
125 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
131 盛世危言

137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143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149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第三辑 史学类

163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72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179	史学方法导论
218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
222	明成祖生母记疑
232	夷夏东西说
279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305	故书新评
321	出版界评

亦儒亦侠的傅斯年

唐元明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6岁入私塾,10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1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子水等组织新潮社,负责编辑《新潮》月刊,影响很大。同时发表《文学革新申义》等力作,响应胡适的名文《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后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大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受蔡元培之聘,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

长。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突发辞世。

在傅斯年短短55年人生中,少年英姿、壮怀激烈,时代弄潮、书斋学者,教书育人、参政议政,多重角色集于一身,各个方面都很杰出;同时,他还是有名的“大炮”“老虎”“诤友”等。借用乃师亦友胡适的评价是:“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者,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傅孟真先生遗集》序)傅斯年的学友罗家伦也曾这样称道他:“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虽都有爱惜和褒扬的成分,但确是持重之论、知音之辞,说出了傅斯年富于学、精于业、激于义、尚于德的才情与操守,他身上也折射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诸多光彩照人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精神。

“五四”先锋

在北大求学期间,傅斯年受到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时彦影响很大,钟情新学,思想自由,崭露头角。1918年,他与同学罗家伦等创建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担任主任编辑,很快吸引了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绍原、张申府、高君宇、谭平山等一批优秀作者,佳文迭出,关注度高。虽然《新潮》的政治色彩不如《新青年》那么强烈,但其坚决主张民主自由、民族独立、男女平等、社会清明,并以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的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价值,反对一切保守、迷信与盲从,二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因而学界普遍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就连胡适也情不自禁地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称誉:“《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

解也成熟得多。”此说虽有对《新青年》后来办刊思路激变的不满，但也确实反映了《新潮》在当时的重要影响。同时，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起，先后在《新潮》《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等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近70篇，响应文学革命，倡导自由思想，批判保守文化，评鹭社会问题，引起广泛瞩目。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组织了“五四”运动，自己曾回忆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确实起到了北大游行队伍总指挥的作用，可谓影响深远，彪炳史册。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称赞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可谓意味深长。

学者本色

傅斯年出生于名门世家，先祖傅以渐系清王朝开国状元，后代代诗书传家。他幼承庭训，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功底。1919年冬出国，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7年，所学多属自然科学，也兼及语言学等。虽然没进修历史学课程，但他读书很博，哲学与历史自然要涉及，其“史料即史学”的思想就是受当时风行德国的兰克学派所影响。尤为重要的是，他掌握了西方的科学理论与治学方法。正如罗家伦所言：“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蒋梦麟也说：“孟真博古通今，求知兴趣广阔，故他于抒发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对于研究学问，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忆孟真》）的确，20世纪初年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真正影响大而见识高的并不多，傅斯年当属其中佼佼者。

傅斯年有两句学术名言，一句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

西”，强调现场考察和实证资料的重要性；另一句是“史学即史料学”，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些观点和原则虽不乏重要意义，却也引起过争议。学界推崇傅斯年在学术上、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创新之举，乃是推动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及现代化，以符合西方科学标准的研究来拓展学术新境。特别是利用反复实验，考证和确定客观规律与事实；用自然科学心态看待历史，让史学成为历史科学；以新工具引出新问题，检验旧材料，创造新的研究领域与材料，让史料研究、搜寻、佐证成为学术研究核心。同时，他又强调，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但这还不是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涵义应更宽广，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反映出它真实的本来的面目。这些理论观点与不断实践铺就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之路，从而创立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上重要的史料学派，傅斯年居功甚伟。

傅斯年创造性地提出，历史可以“断世”而不必“断代”，坚持“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以“断世”，并形成了建构明晰的“断世”体系。他强调，须以“种族与文化”作为治史的核心，而且“种族”也多归因于“文化”。他在《中国通史纲要》（北大授课讲义）中，明确提出“以‘民族迁动’为中国史分期之标准”。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又主张：“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他强调：“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在1931年给陈寅恪的信中，他再次重申：“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同时，傅斯年也注意到历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即上世为“政治变迁”，中世为“风俗改易”，近世为“种族代替”。

傅斯年的史学代表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中国史专著,可惜生前只完成三分之二的內容。《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等名篇皆是该书的章节。《性命古训辨证》《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史学方法导论》《东北史纲》《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等也属系统、厚重之作。这些论著多有精义和创见,不少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何兹全)。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曾称赞的那样:“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

傅斯年不仅有学术雄心,更富有学术事业心。他学识渊博,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在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的发掘研究等重大工作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1928年,他负责创办中研院史语所,并担任所长23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如李济、董作宾、丁声树、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严耕望等。组织出版学术著作上百种,影响深远。1928—1937年,傅斯年排除阻力,组织专家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抗战前非常时期,他组织抢救、整理清朝内阁大库中8千麻袋总计15万斤的明清档案,都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并争取到史语所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考古学家李济曾赞叹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

臣,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北大“功狗”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不仅是北京大学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台湾大学的勋臣。从早年进入北大读书开始,他就一直献身大学、休戚与共,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学术上和行政管理上都能应对自如,令上下称道。在1929至1948年间,他几乎一直兼任北大(包括西南联大)教授,积极出谋划策,做了很多校务管理工作。多年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深情地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在胡到任前的一年间(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傅任代理校长,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如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对伪北大教职员处置等。他以“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毅然决定对周作人等附逆人员一个不用,“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为迎胡适回校铺平了道路。他在写给夫人余大綵的信中曾直接表露过心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因此,他曾自诩为胡适的“清道夫”“保驾人”,并对蒋梦麟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功臣”,北大精神的创始者;而他与蒋梦麟只不过是北大“功狗”。这种勇于献身、甘作绿叶的高尚精神,着实可歌可泣。

1949年1月,傅斯年在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力劝下,赴台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他以“埋骨于田横之岛”的决心,筚路蓝缕,全力以赴,用极短的时间就把混乱不堪的台大整顿引导进入正轨,并建立起长远制度及良好校风,形成教育及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传统。学人李东华曾称道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功勋尽瘁,死而后已——傅斯年先生在台

大》)

国士无双

傅斯年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满腔热血、仗义直言、勇往直前是其个性。罗家伦曾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他的秉性与才气，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写道：“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1932至1937年，他和胡适等师友以“书生报国”的情怀，捐资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事百态，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九一八”事变后，他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正义呐喊争胜，发表了《东北史纲》《日寇与热河平津》《政府与对日外交》《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汪贼与倭寇》等一系列文章，抨击绥靖卖国政策，提出抗日救亡主张，激发知识界及全社会的爱国精神。

“百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将两位显赫一时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孔、宋先后担任行政院长，长期掌管国库钥匙，贪污腐败，发国难财，使民怨沸腾。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拍案而起，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并在影响很大的《大公报》上连发檄文，敦促“这个样子的”孔祥熙、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朝野震惊，两人先后被迫下台。毛子水盛赞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蒋廷黻也称道他的论政之作“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深切独到，烛照幽暗。的确，他正气凛然，眼光犀利，笔力千钧，所向披靡，因而赢得“傅大炮”的美誉。

傅斯年对邪恶势力总是表现出金刚怒目、不共戴天的一面，而对待师友与弱势群体又往往体现出尊重、宽容与温煦的一面。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虽然两人政见有异，但他在《独立评

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称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赞美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胡适也曾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他确实甘于冲锋在前，尽力顾惜时贤。他为无数教师学生等提供过帮助，如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想方设法关心陈寅恪等名家的生活与健康，也为林徽音等知识精英的工作与身体费心筹措。他曾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应“无惭于前贤典型”。

傅斯年一生不党、不宦。虽有多次仕途机遇，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不愿从政，而愿意参政议政。他曾说：“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并表明态度：“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始终关注政治、心系社会，却能抱守名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林徽音、梁思成称誉其“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循私”，信哉斯言。

本书精选傅斯年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重要章节、论文、时评、书信 28 篇，涵盖教育、政论、史学、文学及学术方法等若干方面。教育类 12 篇，涉及教育改革、大中小学定位与重点、教师选择与教材建设、教学与研究的关系、中国学校制度历史与现状考察等，体现了其教育兴国、教育独立、教育机会平等核心思想观念。特别是维护学校与学术自由，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严格挑选校长和教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等主要教育观点，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时论类 7 篇，既有作者写于 1918 年的思想发轫之作《文学革新申义》和有名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也有《汪贼与倭寇》《盛世危言》等抗战中救亡图存的急切呼吁，以及抨击豪门巨族祸国殃民的正义之声，展示了傅斯年作为时代先驱、民族栋梁在社会变局和危难中的智慧、勇毅与担当。史学等方面 9 篇，选录了作者较早提出其史学观与办所方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系统阐述史料发掘、鉴定与应用方法的《史学方法导论》，开辟中国历史研究重大系统观念的《夷夏东西说》，显示辨疑文献、考